

“南路边茶”历史发展述略

赵长治, 谢雪娇

(西南民族大学 博物馆,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南路边茶的整个形成发展过程都与其所依赖的藏汉文化间的交流是分不开的。这种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贸易的交流。我们在研究南路边茶的发展时,首先需要对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南路边茶;历史发展;述略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0)01-0068-06

“南路边茶”是指以雅安为制造中心,行销打箭炉及卫藏一带(在明代指阿里、藏(后藏)、卫(前藏)和康四部分)的边茶。^[1]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承都依存于一定的环境。南路边茶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其独特的产、销分离的现状,与环境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密切。目前,南路边茶的独特制作工艺已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工艺特色也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作为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一种谋生手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共同体、群体应对自然环境挑战而进行的一种创造。因此探讨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特别关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对理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兴盛以及衰落的原因,探讨其文化底蕴和深层内涵都有重要的意义。”^[2]南路边茶在其慢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产生到当代的发展,都与其所依赖的藏汉文化间的交流是分不开的。这种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贸易的交流。我们在研究南路边茶的发展时,首先需要对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梳理和研究。

一、藏地茶叶的传入与饮茶习俗的形成

(一)藏地茶叶的传入

我国藏族聚居地区,平均3500米以上,干燥、苦寒,历史上素不产茶,茶叶传入藏区的具体时间虽然尚有争论,但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是唐代。唐代《封氏闻见记》中就有如下记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穷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3]而茶叶入藏究竟始于唐代何时,史料中有多种说法。

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即大约在公元632年左右。“茶”古称“荼”,至唐代才易“荼”为“茶”,并有了更多的称呼,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笋”。^[4]而藏族从古至今,茶的发音均为“甲”,这很有可能系汉语“檟”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因此,《史话》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又据《西藏政教鉴附录》载,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5]

即汉地首批茶叶是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地区的,这比《史话》中认定的传入时间晚了近十年。《西藏史话》则记载如下:“茶叶产于内地,藏王赤都松时期(公元676—704年)开始传入西藏。《红史》记载:‘他(赤都松)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茶叶,器乐……’。”^[6]另外,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写道:“在安史之乱后的三十多年里……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汉族地区的茶传入吐蕃……”^[7]这又比文成公主入藏晚了一百多年。

唐代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瀘湖者。’”^[8]由此可看出,当时各种名茶,吐蕃王宫里差不多都有,但赞普却不识烹茶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习俗尚不普遍,茶还是被当作珍贵之物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饮料。这一点可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得到佐证:在大量写卷、木简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资是青稞、小麦、米、酒、牛、羊、皮张等,唯独不见有茶的记载。由此也可推知,至少在公元九世纪初之前,饮茶可能只是吐蕃上层贵族的一种享受,而民间还未形成普遍饮茶的习惯。^[9]

(二)藏地饮茶习俗的形成

藏地饮茶习俗的引入与普及则要晚于茶叶的引入。《汉藏史集》中的《甘露之海》一篇记载了饮茶之法的传入:“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此后噶米王(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10]另外,《甘露之海》还介绍了吐蕃“以前未曾有过的犹如天界甘露般的茶叶”如何区别种类,以鉴别汉地茶叶的好坏。这说明在茶叶传入藏地之后,饮茶习俗也开始随之传入藏地。

《封氏闻见记》中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终使僧人饮茶成风。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大量禅宗僧人相继赴藏传法或经由吐蕃到天竺求法,将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也传给了吐蕃

收稿日期:2009-09-22

作者简介:赵长治(1977-),男,重庆市人,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民俗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民俗文化;谢雪娇(1983-),女,藏族,甘孜州理塘县人,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民俗学研究生,艺术学院专职辅导员。

的僧人。而自赤松德赞之后的崇佛运动,使藏地僧人地位尊崇,由于吐蕃民众对僧人的崇敬,他们的饮茶之法极易被人效法。达玛灭佛运动之后,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众的僧人又将饮茶习俗直接传播于普通民众之中。

同时,藏族人民大多居住在海拔 3000 至 4500 米左右的高原上,气压低,气候干燥寒冷,常易发生机体缺氧症和低压症,食品结构又多为牛羊肉食、奶酪、青稞等不易消化的食品,蔬菜瓜果较少。而茶中富含茶碱、单宁酸、维生素,正好弥补藏族饮食中的缺陷。其中单宁酸能分解脂肪,帮助消化;茶碱能兴奋精神,消除疲劳,安定心神;维生素可以弥补因蔬菜水果缺乏而易患的维生素不足。因此,适量饮茶,即可保持人体生理正常水分的平衡,又可摄取茶叶中的生物化学物质,有助消化,这对于调节生理代谢机能,防止缺氧症和低压症有着特殊功效。^{[5](P3-4)}正如《滴露漫录》所言:“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11]

由于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两方面的原因,茶自传入藏区,经由王室、僧院到民间,逐渐推广传播,自然而然形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在藏族中形成并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嗜茶”习俗。茶成为了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对茶的需求,达到了“旦暮不可暂缺”^[12]的程度,民间也有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和“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5](P4)}

二、政治之茶:“以茶治边”政策的形成、发展与衰落

茶成为了藏族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饮料,然而藏区并不产茶,于是汉地产茶,藏地需茶,由内地与藏区生产结构差异所决定的贸易交换也就应运而生,因这种贸易最初主要是以茶换马或以马易茶的形式进行,历史上又称之为“茶马互市”。汉藏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至清后为边茶贸易所替代,旷日持久,兴衰有时,却又从未间断。在这个过程中,茶是商品,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其政治属性又远远超过其商品属性,茶马互市以及后来的边茶贸易与政治紧密交织在一起。随着茶马互市的出现,“以茶治边”政策应运而生,茶成为了中原王朝治边政策的承载之物,成为了“政治之茶”。

(一)南路边茶的由来

在茶叶贸易流通上,虽然产茶区域很广,但最早并且真正大规模与藏区进行茶马互市所用的茶叶还是来自四川,而通过贸易进入藏区的边销茶叶则来自雅安及周边一带。雅安地区是世界文字记载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地区之一。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西汉有僧从岭表来,以茶植蒙山。”^[13]明代蒙顶甘露寺古碑记载:“西汉有吴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师者,自岭表来,挂锡兹土,随携灵茗之种而植于五峰。”这些证明雅安地区早在西汉时期已有了人工种茶的记录,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雅安是四川的主要产茶区,史料中有“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的记载。^[14]隋唐时期,雅安一带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唐朝四十三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品。”^[15]《雅安县志》(民国版)记述:“历史上的雅州,其茶树为一县专有之利。”^[16]由《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汉州、蜀州、邛州、眉州和雅州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

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顶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17]

自唐代茶马互市的兴起,因为与藏区相邻的地理条件和茶叶的产量以及优良品质,雅州一带成为了边茶贸易的主要产地,其所产茶也最受藏族人喜欢。正如《西藏史话》中所记载:“……他们(吐蕃人)最喜欢饮用的茶是四川雅安及周边地区产的边茶”。^[6]至清中叶以后,边销之茶由“茶引制”改为“招商引岸制”,规定了四川四个交易口岸。以雅安为生产中心,包括周围的名山、邛崃、天全、荥经四县为一个口岸,该口岸的“批验所”(后来改称“茶关”)设在打箭炉(康定),从当时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茶叶集散中心成都到该口岸的路通常是出成都南门,因此,称此路所产茶为“南路茶”。

(二)唐代:茶马互市的开端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茶叶作为当时的一种产业,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比较发达。在唐中叶之前,虽然产茶区已遍及江南和华南地区,但是全国茶叶的生产中心仍然在四川,同时四川还是茶叶的加工和贸易中心,亦有“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18]之说。随着当时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贸易的兴起,茶叶开始畅销海外,与丝绸、瓷器一样,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而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又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自身饮食习俗的特点以及双方生产结构的差异,吐蕃等族对汉地茶叶的需求越来越大,在于中原汉族进行的经济交流中,自发出现了出卖马匹、购买茶叶的商品交换,开创了茶马贸易的先河。据《封氏闻见记》所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13]唐代最早和藏地进行茶马交易所用之茶就是出自四川,后来大规模运往长安和进入吐蕃的茶还是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所产茶叶。据《新唐书》记载,最早的茶马互市是“明年(开元十六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的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19]自此,唐藩一直以赤岭为互市地点,彼此都恪守界约。当时吐蕃为了做好茶马的交易,曾派专人经营,称为“汉地五商茶”。但一方面由于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唐朝强大,战事较少,并且唐朝控制着河曲和幽州两个优质的产马地,不需要大量的战马来扩充军队,茶马互市只不过是朝贡官员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所进行的各种商品交易中的一种,在汉藏经济交流中尚不占重要地位。对唐朝而言,仅仅是安抚吐蕃,令其不扰边境的一种政治措施,茶马贸易还只是出于初级阶段,并未成为一种专门制度。

唐初,对茶叶的管理并不严格,并不对茶收税,也没有明确的茶法,茶叶的生产和流通都较活跃。中唐以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则课以重税,继而实行垄断。据《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九月,与漆、竹、木、商钱并税。”后茶税一再增加,“初税一百,增之五十。”^[20]于是茶税称为唐王朝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自开征茶税后,面对濒临枯竭的国家财政,中原王朝又开始实行榷茶制。(“榷”:独木之桥也。《史记集解·五宗世家》中言:“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 835 年),“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21]实行榷茶制之后,所有茶叶都归官府经营,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销全部由国家垄断,只准官方拥有茶园。私人茶园必须将茶树移入官方的茶园中,私人不得种植、制作、储藏和买卖茶叶,发现私茶一律焚毁,并处以

重刑,“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僦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22]唐代榷茶制的施行,已达残暴无情的程度,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天下大乱,献榷茶之利的王涯被乱石砸死。于是,同年十二月,“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21]

虽然大和九年的榷茶制只经历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却打击了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当时茶叶主产区四川的茶叶生产和流通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同时,它又开了官府茶叶垄断的先河,对后来历朝历代的茶政制定和边销茶管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宋代:以茶博马的兴起

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茶叶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由于宋王朝建立之初,便面临北方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并且在唐代所控制的河曲和幽州优质养马地也相继失去,为了加强国防,需要大量的战马来充实军队,而获取战马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茶市马,“茶马互市”遂成常态。为了易得更多更好的战马,宋朝廷专门建立了提举茶场和提举买马司两个机构管茶和理马,即所谓“文官管茶,武官管马”。经历几分几合之后,并茶马两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宋史》记载“都大提举茶马司”的职责为:“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23]

宋朝初年,因为军事与经济上的双方面原因,朝廷对茶叶实行禁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6年),朝廷在江宁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设“六榷货务”,又在蕲州、黄州、庐州、舒州、光州、寿州设“十三场”。种茶者称之为“园户”,园户所产之茶不准自由买卖,民卖茶皆售于官,即全部卖给“十三场”。“十三场”除从园户买茶的业务外,还兼有卖茶给商贩的业务,而“六榷货务”则专管茶叶的运输和发卖。商贩给券为凭,从官府购买茶叶后,除内销外,可运到原、渭、德顺三地自由与“蕃商”进行茶马交易等贸易活动。但是,宋初的这种榷茶制度并不施行于四川茶区。虽然当时蜀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24][25]},但由于四川政局不稳,先后发生了二十多次农民暴动,与官府发生多次大规模冲突,导致官府不敢贸然在川榷茶,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前一直准许川茶自由买卖,不过只准销川陕四路,不得出境,呈现了“天下茶皆禁,唯川陕、广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25]的局面。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与西夏的战争造成陕西发生了“马道梗阻事件”,北边的马源枯竭。于是宋王朝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诸州转移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当时四川的黎州(今汉源县)、雅州(今雅安)是通往康藏地区的交通要道,于是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神宗七年,王韶收复熙河六州之后,入朝问对答曰:“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23]神宗遂遣“三司盐铁判官李杞、三司句当公事蒲宗闵经画川、蜀买茶,充秦凤、熙河路博马,就除提举成都府路买茶公事”^[26]“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27]这是封建王朝垄断西南边茶贸易的开始。元丰四年(公元1091年)特诏“专以茶易马,以蕃人所嗜。”又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之用。”^[27]至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再次诏令“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格遵神考之训”,并“定为永法”,严禁把名山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

取厚利”。^[28]

到了北宋末年,朝政日非,茶马互市难以为继。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言,直陈茶马五害,罢川茶官榷,复行通商法,变茶息为茶税,遂改“榷茶制”为“茶引制”,允许商人认引纳款后,按规定数量进行贸易。^[16]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北方失陷于金,西北茶马互市全面停止,朝廷将茶马互市的中心移到四川雅安一带,茶叶的贸易集中到成都府。除直接与西边来的蕃商进行茶马交易外,西北的临洮、岷、叠、宕等州的少数民族客商都来四川腹地进行茶马交易。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朝廷又在四川黎州(汉源)、雅州碛门(天全)、灵犀岩(宝兴)设易马场易马。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宋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保证官府对茶马贸易的垄断,究其原因,通过“榷茶制”、“茶马互市”,首先可获得巨额利润,以充盈财政收入,同时其获得的经济利益以及所易之马皆可满足宋王朝的政治军事利益,以充实壮大军队。如前文所言,在宋时,唐代所控制的河曲和幽州优质养马地相继失去,又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以茶易马成为了宋王朝战马来源的重要手段,乃至唯一手段。吐蕃部族需要茶叶,而汉地需要战马,以茶叶易马可获得大量的好马。其次,利用吐蕃部族对茶的需求和依赖,通过茶叶来控制边疆,羁縻边疆各族,笼络吐蕃各部,达到“以茶治边”之效。宋王朝通过给予吐蕃部族种种优惠和便利,规定博马茶的价格低于杂卖茶的价格,且马价高于茶价,以这种“减价以至马多”的政策,达到“马来既众”的作用,使吐蕃各部接受并承认宋王朝的统治,以保持边境的安宁,同时以其作为边境防御的屏障,改善局部战略上的弱势。如宋朝通过茶马贸易收复河湟地区的唃廝罗政权就是一个成功的“以茶治边”实例。正如《洮州厅志》中所言:“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蕃矣,说者以为有三利:捐山泽之毛,收驂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蕃族,俾仰给我,而不背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作我外篱,利三。”^[29]

(四)元代:茶马互市的暂衰

元朝统一中国后,初期在茶政上仍然实行官方垄断的榷茶制,并明文规定“私卖茶叶者,其罪与私盐同”。^[16]但由于蒙古族本身产马,加上西藏、青海、甘肃等均属元朝版图,马源十分充足,以茶易马完全没有了意义,故而元初官方对茶叶的垄断则完全着眼于增加财政收入,原来西南和西北的茶马市场就变成了茶土交易的市场。同时,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效仿宋代实行榷茶制,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碛门(天全)等地互市,通过对茶叶的垄断,利用吐蕃部族对茶的需求和依赖,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但由于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官方垄断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30]虽然榷茶机构还在,实际上已变成“茶引制”。得益于“茶引制”,四川茶业一度得到发展。但至元成宗大德初年(公元1297年),蒙古兵入西川,张觉、王箴等人举兵反抗,元朝廷诏以黎、雅、碛门诸处人不奉国法,派戎兵万余人到名、雅、黎镇压,因戎兵任意杀戮,几无噍类,川西的茶叶生产一落千丈。^{[24][33]}

(五)明代:茶马互市的鼎盛

明代统一中国后的200多年里,北方一直多战事,北蒙对边境的骚扰一直未成停歇,对战马的需求不言而喻。同时,藏区与

明王朝的关系,已由宋代松散的从属关系转变为直接隶属关系,为了更好的控制藏地,使之不敢叛离,更加需要通过藏地一日不可缺的茶叶来束缚。因此明朝廷仍效仿南宋时以茶博马的“茶引制”,重施重茶马制度。正如《明史》所载:“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31]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在全国设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其后又增设碉门(天全)、黎(汉源)茶马司。户部言:“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31]明太祖又诏:“天全六蕃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32]四川的茶叶在明代得到了促进和发展,随着茶马互市的复兴,在茶叶贸易上,特别是以茶易马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茶马互市形成了两条通道,一条是出陕西河州往西和西北方向,这个方向是在明朝收复西北地区,重开西北茶马市所形成,河州易马之茶皆出自汉中府和保宁府,其中绝大多数由四川提供。而另一条通道则是出四川碉门、黎州运往前藏、后藏、山南、阿里等地,于“雅州的城南置阜民司”,“碉门百户所设茶马司”,在雅安、天全易长河(大渡河)以西诸蕃之马。当时,四川的官茶一部分派兵征夫运到陕西、甘肃等地茶马司,另一部分则由官府招商代运代卖运茶到打箭炉(康定)。

在茶政的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即“差发马”制。金牌信符为要约,目的是为了防止私茶入蕃和刺激蕃人以茶博马。^[33]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接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

明代茶政,如上文所言,其目的与宋相同,一为战马,二为治边。但细致分析,不难发现明代茶政的首要目的在于治边,而战马的获取也是从属于“治边”这一首要政治题目。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御史刘良卿论边茶之利害时说:“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於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31]《殊域周咨录》中则说得更加明白:“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纳马而酬以茶斤,则我体既尊,彼欲亦遂。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轻重得失,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责番夷以差发,非若秦、汉喜好大勤远略者之所为也。亦非中国果无良马而必有待于番夷也。盖西番之为中国藩篱久矣。”“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答。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盖以一叛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而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远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34]《殊域周咨录》中提到的“差发马”制度虽然保留了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已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33]这一制度体现了明朝对藏区的统治关系,而且是属于第一位的,它标志着明王朝对藏区进行了直接稳定的统治,体现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力。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首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

(六)清代:边茶贸易的兴起

清顺治到康熙中期,中央政权不稳定,边疆地区一直战事不

断,国内叛乱也是有发生,清廷不得不买马扩充军队,同时国家财政困难,需要扩大茶税的征收,以补充财政收入。故清廷“踵前朝故事”,沿袭明代的榷茶博马政策。当时以茶易马主要集中在西北五茶马司。至康熙后期、雍正年间,蒙古平定,三藩之乱已熄,边疆局势趋于缓和,对战马的需求下降,再加上茶叶产量的增加,至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停止五司中马。“榷茶制”完全被废除。

官营的茶马制度结束以后,茶叶的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取“茶马互市”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同样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化的边茶贸易制度,边查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代替“榷茶制”,汉地的主要交易商品还是茶叶,此外,其他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商品也进入市场,而藏区输出的交换商品则不在仅限于马,而包括香料、药材、宝石、玉器、兽皮、羊毛、黄金、象牙等土特产品,这时的马匹仅仅是宗多土特产品中的一种。到康熙后期,四川茶叶产量迅速增长,以茶叶为主要商品的汉藏贸易也直线上升,打箭炉(康定)和松潘逐渐成为汉藏贸易最大的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尤其是打箭炉,其地方汉藏贸易之兴盛可以从这一地区商税之不断增加略见一斑。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后,打箭炉每年正额税银为5316多两,而1801年(嘉庆六年)则增榷至20000两。如按官定税率,按货物价值每银一两征银三分,则这两个榷额所反映的货物总流动量为:1594.80两和600000两。^[35]^[344]清代川茶有腹引、边引和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为三道:经打箭炉销往康、卫藏地区者,谓之南路边引,乾嘉之际每年行引53004张;经松潘销往川北草原、甘青藏区者谓之西路边引,乾嘉之际每年行引19023张;邛州所产茶谓之邛州边引,主要销往四川各土司地方。^[36]^[37]若每引按100斤计算,则每年仅从打箭炉一地销往西藏地方的茶叶就达5300400斤。^[36]“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帖。”^[36]其数量相当可观。

与茶马互市浓厚的政治色彩一脉相承,边茶贸易同样也是清廷加强和巩固藏区统治的重要措施。康雍乾三朝,是清中央政府大力加强控制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时期,为顺利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将康藏地区各土司辖地直接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控制边茶贸易,“视蕃情之向背,分别通禁”,依此来拉拢分化各土司势力,辅助军事平叛。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新疆准噶尔部叛乱,清廷在平叛过程中就区分主从和向背情况,“里塘、巴塘番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38]而对西路边茶,涉及青海与准噶尔部“联姻”关系,则“西藏资茶养生,应令松潘禁茶出口”。^[38]到了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仍沿用边茶的分化笼络手段。每当乱事一平,清政府立即恢复并扩大边茶供应,巩固军事成果,加强对康区各部族的控制。^[39]

至清末,英国武力入侵西藏,同时英印茶商向藏区大肆非法倾销印茶,使汉藏经茶马古道进行的边茶贸易受到猛烈冲击和影响。为阻止英国势力渗透西藏,清廷沿用“以茶治边”的旧有套路,以边茶为政治经济武器,力图抵制印茶入藏。清政府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但终因清王朝的覆灭而不了了之。至此,藏区与内地之间传统的经济关系遭受了巨大打击,而潜藏于经济关系之下的中央——藏区政治结构也随之动摇。

(七)民国:边茶贸易的衰落

民国建立之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内战不断,民不聊生,

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冲击,茶业也难逃厄运。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边茶生产、加工与运销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民国初年,由于受到政局和内战影响,以及印茶倾销的打击,边茶产销一直处于萎缩趋势,“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33]但是,国民政府依然没有放松对边茶的控制,“以茶治边”的政治思想仍旧贯穿始终。当时甘肃省主管茶业事务的赵文龙对省主席建议道:“西北蒙古各族,有的横悍难驯,控制稍弛,动辄背乱,历世政府御边,每遇应对棘手之时,恒以断绝粮茶,为重要控制之工具。”^{[24](P52)}为达到以茶治边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中国茶叶公司,并企图在西康雅安成立分公司垄断四川南路边茶,被抢先成立的地方资本与官僚资本联合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所取代,康藏公司开始了对四川南路边茶的全面垄断。然而由于康藏公司排挤同行,同时又压价收购,高价销售,加上产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导致该公司在经营上举步维艰,地方资本纷纷推出,垄断就此打破,但南路边茶的正常经营却已因之前的恶性垄断雪上加霜,再次受到了打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贪图南路边茶的利润,一大批官僚资本与官商合作的茶号纷纷成立,后因战事又起,局势动荡,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同时国民政府对藏区的控制力因为英国势力的渗透而日渐弱化,印茶对边茶的冲击也随之不断加大,致使边茶业再入泥潭。至1949年,四川南路边茶的加工企业仅存48家,其中雅安30家、天全10家、荣经8家。康定经营边茶的“锅庄”也由48家减少至25家。边茶原料产量只有3万担左右,年加工边茶成品仅36000担。^{[24](P55)}南路边茶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边茶贸易走向了衰落,而以茶为载体的“以茶治边”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三、民生之茶与团结之茶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让旧时代建立在民族歧视、华夷对立思想之上的“以茶之边”、“以茶奴番”政策走到了尽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新政策,赋予了边茶新的意义,旧时代的“政治之茶”转变为了新社会的“民生之茶”与“团结之茶”。

(一)解放初期南路边茶的振兴

解放前夕,中国进入了新旧社会的交替时期,雅安南路边茶经历了清末于民国时期两次官方垄断经营的折腾与印茶的冲击,绝大部分中小茶商把多年积累的资金付之东流,并被排斥于边茶业之外。而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形势恶化,部分劫后余生的茶商重又陷入绝境,无法正常进行原料收购、加工和销售。而另一方面,藏区民众又大量需要茶叶,但其所生产的土畜产品却无法销售而由大量积压。整个南路边茶业处于极度萎缩的局面。特别是1949年12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起义,至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接管雅安前的50多天里,国民党特务到处破坏,土匪横行,致使成(都)、重(庆)线和成(都)、雅(安)、康(定)一线交通受阻,各项商货被迫停止流通,使得本已陷入绝境的南路边茶业雪上加霜。^{[5](P15)}

时任西南局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指出:把民族工作搞好,一是要讲民族团结;二是民族贸易。“藏族要吃茶,在藏族生活中,最要紧的是茶叶,这就是说把茶叶发展起来,把茶叶给藏民送进去,使他们能买到茶叶。”^{[5](P15)}新成立的西康省人民政府一方面重点打击和肃清国民党特务活动,平息土匪叛乱,稳定

社会秩序,保证交通通畅,一方面把恢复边茶的生产和供应作为重要大事来抓。针对当时边茶产销状况,政府制定了发展边茶生产的方针,强调“要照顾茶农和茶商的利益”,“注意安排好粮茶比价”和“扶持正当茶商”,并规定了茶叶和土特产的交换比价等。^{[5](P16)}同时,政府通过收购积压茶包和委托代制加工,帮助茶商渡过难关。并且从1951年起,政府对边茶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政策,允许私人企业经营边茶加工,但在产品销售上实行垄断。先由政府 and 私营企业签订边茶加工订货合同,产品生产出来后由政府统购包销。这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对当时的人民政府来说,对物资进行垄断调配,可以充分发挥其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另一方面对茶商来说,政府承担了运输和销售中的货物安全,以及资金回收的风险,使得茶商能够全力关注生产,使南路边茶业能够得到快速恢复。至1952年,私营边茶业完成21078担,其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20663担,占总产量的98.03%,并获得纯利润24160元。^{[5](P21)}

(二)边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有化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直接将原国民党以官僚资本兴办的边茶加工企业:中国茶叶公司、西康茶叶公司、康藏茶业公司和康藏茶业公司荣经茶厂接管,并转变为国营企业。在三年的经济恢复期中,南路边茶业一直是国营和私营企业共存,并以国营企业为主。其间,众多经营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较弱的小茶号纷纷联合,成立私营联合体,但与国营企业相比,在生产规模、企业发展速度、管理水平方面都处于弱势。在各方面压力下,从1951年起,南路边查私营茶号纷纷提出公私合营,采用国家参股,处于控股地位,对私股进行核查,而原私营茶号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一律不变,合营后实行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员工享受国营企业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企业享受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条件。经过1951年到1954年四年的努力,于1954年9月,全部的私营企业都实现了公私合营。^{[5](P24-25)}

1956年,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又开始了新一轮合并,如公私合营中翥茶厂与中康茶厂合并成“公私合营雅安茶厂”,1958年,又将“公私合营雅安茶厂”并入“国营雅安茶厂”。随后,天全和荣经的公私合营茶厂也并入了国营茶厂。^{[24](P62)}至此,私营的边茶加工企业全部国有化,形成了地方国营雅安茶厂、地方国营荣经茶厂、地方国营天全茶厂,三个四川南路边茶的骨干加工企业,雅安地区的资本主义边茶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三)从政治之茶到团结之茶

边茶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一直被历代王朝作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奴役少数民族,实行其“以茶治边”、“以茶奴番”政策的工具。历代朝廷乃至民国都对边茶严加控制,不许番区种茶。民国31年出版的《康藏史地大纲》中载:“番人嗜茶如命,一日无茶,社会不安”,“明太祖知茶叶足以控制番夷,又定茶法,较宋尤为严密”,“令诸近州县,严私茶之禁,重通番之刑,以制边夷”。^[40]统治者不但在边茶生产上可以重税,垄断经营权,限制其销量,而且严禁藏区种植茶树,却对不准茶树苗和茶种流入藏区,如有违禁致死罪。到1950年时,康区藏民都知道“旧社会不准把茶种带过二郎山,谁要把茶种带过二郎山那是要杀头的。”^{[5](P17-18)}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也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边茶之禁也就烟消云散。人民政府不仅在边茶产区积极发挥生产,提高质量,扩大产量。同

时也打破了一千多年来对藏区在茶叶种植上的禁锢。在康区的泸定、西藏的波密地区试种茶树成功,并且还引进制茶技术,建设茶叶加工厂,培养藏族茶叶技术人员和制茶工人。藏区人民称:“共产党为各族人民谋利益,把我不敢想的东西送给我们藏族人民,今后就可喝到便宜的茶了。”^{[5](P18)}至此,旧时代的“政治之茶”,转变成了新时代的“民生之茶”、“团结之茶”。历代王朝“以茶治边”没有能彻底笼络住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心,而新中国的“以茶促团结”却把少数民族人民的心与人民政府紧密联系了起来。

参考文献:

- [1]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Z].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 [2] 王巨山.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博物馆化保护研究——以杨家埠木版年画制作工艺的考察为例[D].山东大学,2007.
- [3]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4]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 [5] 南路边茶史料编辑组编.南路边茶史料[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 [6] 陈庆英,丹珠昂奔,喜饶尼玛,廖东凡,张晓明等.西藏史话[M].福州:鹭江出版社,2006.
- [7]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 [唐]李肇.唐国史补[DB/OL].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tangyanjiu/tdsl/tbdd/tgsb_004.htm.
- [9] 任新建.藏族饮茶历史小考[J].茶周刊,2004,(44).
- [1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 [11] [明]谈修.滴露漫录[M].
- [12] [宋]吕陶.净德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4]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七·饮食部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唐]陆羽.茶经[DB/OL].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gxzi/cj/cj.htm.
- [16] 胡荣湛.雅安县志(民国版)[Z].成都:巴蜀书社,1992.
- [17] 陈世松主编.四川简史[Z].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18]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六·东坡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

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1]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 本纪第十七下·文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志第四十四·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3] [元]脱脱.宋史 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4] 李红兵.四川南路边茶 [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 [25] [元]马瑞临.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6] [元]马瑞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二·职官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7] [元]脱脱.宋史 卷一百八十四·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茶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8] 张栩等为.名山茶业志[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 [29] [清]张彦笃总纂,包永昌分纂.洮州厅志卷十六·蕃族·茶马[Z].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30] 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西藏研究,2002,(4).
- [3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2] [清]陈松龄.天全州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1990.
- [33] 杨嘉铭,琪梅旺姆.藏族茶文化概论[J].中国藏学,1995,(4).
- [34]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一·西戎[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35] 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Z].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 [36]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志九十九·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7] [清]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六十九·食货志·茶法[Z].成都:巴蜀书社,1984.
- [38]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八·列传八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9] 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J].中国藏学,1988,(4).
- [40]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M].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

[责任编辑 辛 宪]

On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Route Tea

ZHAO Chang-zhi, XIE Xue-jiao

(Museum,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ichuan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whol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uthern Route Tea is inseparable with Han-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 In history, this cultural exchange is mainly presented with interac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trade. When we are researching Southern Route Tea, we need to analyze and research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Key words: Southern Route Te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iscussion